



喜马拉雅学术文库

阅读中国系列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

〔美〕杜赞奇
王宪明

译 著

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喜马拉雅学术文库·阅读中国系列

CHINA IN REVOLUTION

The yenan way Revisited

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 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

〔美〕杜赞奇 著
王宪明 高继美 李海燕 李 点 合译
王宪明 李海燕 校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
〔美〕杜赞奇著;王宪明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2

(喜马拉雅学术文库·阅读中国丛书)

ISBN 7-80149-845-3

I. 从… II. ①杜…②王… III. 中国—现代史—研究
IV. K26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55144号

喜马拉雅学术文库·阅读中国丛书

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

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



著 者:〔美〕杜赞奇

译 者:王宪明

责任编辑:陈 燕

责任校对:杨蔚琴

责任印制:同 非

出版发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10号 电话 65137751 邮编 100005)

网址: <http://www.ssdph.com.cn>

经 销: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排 版:东远先行彩色图文中心

印 刷:北京增富印制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89×1194毫米 1/32开

印 张:9.25

字 数:226千字

版 次:2003年2月第1版 2003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149-845-3/K·124

定价:20.00元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02-6135号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Prasenjit Duara

阅读中国序

刘 东

已经是第二次在为这类译丛撰写总序了，这件事本身就使我忧心忡忡——我们如此大规模地引进当代汉学，究竟最终对中国文化是福是祸？

如果在上次作序的时候，我们对于西方同行的工作还只知一鳞半爪，那么今番再来作序，简直就像在介绍老朋友的一些新作了。换句话说，其实再没有什么时候，我们曾对汉学有过现在这样系统的、与时俱进的知识，不仅可以密切关注其学术发展的动向，就连译介工作都与其展开过程日渐同步。这当然可以算作一种成绩，不过这小小的成绩却不仅没有使我沾沾自喜，反倒带来了进一步的精神煎熬。作为长期以来此类工作的主要主持者，我完全无法回避这样的事实——越是系统地引进某种活生生的外来学术话语，就越要给原有的文明基础带来深重的冲击和致命的紊乱，古代的佛学是这样，近代的西学是这样，当代的汉学也肯定会是这样。

的确不错，如果借用康德的一个说法，我们可以尖锐地揭露和批判说，人们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文明环境本身，往往会产生某种“先验幻象”，以致对那些先入为主的价值或事实判定，会像对于“太阳从东方升起”之类的感觉一样执信。也正因为这

样，那些学术研究家的文化使命，才恰在于检讨现有的知识缺陷，适时地进行修补、突破和重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毫不犹豫地挑明：任何人都不会仅仅因为生而为“中国人”，就足以确保获得对于“中国”的足够了解；恰恰相反，为了防范心智的僵化和老化，他必须让胸怀向有关中国的所有学术研究（包括汉学）尽量洞开，拥抱那个具有生命活力的变动不居的“中国”。

然而，僵化的另一面却又是泡沫化。汉学毕竟既是中学的一支，更是西学的一支，那中间潜伏着许多未曾言明的外在预设，本质上跟本土的国学判然分属于两大话语系统。正因为这样，尽管中国传统早在西风中受到过剧烈震撼，可一旦大规模地引进作为完整系统的汉学，它仍然要面对着新一轮的严峻挑战；我们甚至可以说，此间的挑战竟还大过对于主流西学的引进，因为它有可能直接触及和瓦解原有文明共同体的自我理解，使国人在一系列悖反的镜像中丧失自我认同的最后基础。当今中国知识界可怕的分化与毒化，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缘于汉学和汉学家的影响。这种要命的相对化刺痛着我们：一旦丧失阅读和思考的主动性，陷入别人的话语场中而无力自拔，就有可能被别人特有的问题意识所覆盖，乃至从此难以名状自己的切身体验，暴露出文化分析的失语和学术洞察的失明。

幸而，我们还没有泯灭进行文明对话的渴望，还把这种对话看成惟一现实的救度之路。在这种深深的渴望之中，国学与汉学这两种自成系统的学术话语，在彼此解构与相互竞争的同时，就仍有可能彼此解毒和相互补充，从而在文明之间激发出辩证发展的“中国性”来。换句话说，对抗着堕入绝对主义或相对主义的双重危险，那个构成了两大学术群体之对话基础的“中国性”，作为双方共同意识的主动构成物，仍有可能在学术的文化间性中不断漂移，在互动的知识增长中不断漂移，在超越的文明对话中

不断漂移，从而使我们既不丧失自我认同的坚实前提，又能跟现实世界构成良性的互馈。

由此一来，“中国”一词所包藏的无尽学术潜力，中国研究领域所蕴涵的无穷思想魅力，也就太值得发挥主动精神去阅读去领略了！这个肯定要伴随我们生命始终的学习过程，也同样需要既不封闭又不盲从的阅读心态，以便同时对抗固陋的本质主义和油滑的虚无主义。我们必须认识到，正像当年的佛学曾经挑战出了宋学高峰一样，我们现在大规模引进的汉学成果，也有可能表现为空前文化创造力的机遇和前奏；而中国事实也终究有可能不再只被遵循外来语法去解释，相反倒有可能在理论创新上对世界表现出顺差。——大家赶紧打开这些书本吧，因为所有这一切，其实全都在我们的一念之中！

刘 东

2001 年 12 月 18 日于北大草庐

中译序

自从杜赞奇先生的《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于1995年由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以来，已有不少学者从不同的文化学术背景对之进行过评论^①。同时，杜赞奇先生本人为帮助读者了解其思想历程、学术背景和主要学术观点，也已应邀在百忙之中为本书中文版寄来了学术自传（见本书附录）。这些都是阅读本书很好的指南。这里谨就本书的主要内容和翻译情况简要介绍如下。

杜赞奇先生的这部新著是继其享誉国际学术界的《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一书之后研究近代中国历史的又一部力作。全书共分为理论和实例研究两大部分，共七章。

第一部分包括两章，是西方经院派学术著作中典型的“理论”模型部分。第一章探讨了近代萌芽中的民族是如何接受西方启蒙历史的叙述结构并用之建构一个从远古向现代发展的民族主

① 有关书评可参见 James L. Hevia, in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volume 47, no.4, (Honolulu, Oct, 1997); Kenneth Pomeranz, in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ume 102, no.4, (Washington, Oct.1997); Theodore Hunter, in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ume 56, no.1 (Feb.1997); Judith Wyman, in *Historian*, volume 60, no.2 (Winter 1998); 李猛：《拯救谁的历史》，《二十一世纪》1998年第10期。相关文章可参见王晴佳《后殖民主义与中国历史学》，刘东主编《中国学术》第3辑，商务印书馆，2000。

体的。在本章中，作者对 1911～1949 年间中国几部较有影响的通史著作中所盛行的上述叙述模式及分期方法等进行了研析。在第二章中，作者提出了“复线的历史”（bifurcated history，一译“分叉的历史”）的观念，来取代长期以来史学界流行的“线性历史”（linear history）的观念。在“复线的历史”中，过去并非仅仅沿着一条直线向前延伸，而是扩散于时间与空间之中，历史叙述与历史话语在表述过去的过程中，根据现在的需要来收集摄取业已扩散的历史，从历史中寻找有利于己的东西，也正因为如此，新的历史叙述与历史话语一旦形成，又会对现实形成制约，从而揭示出现实与历史的互动关系。由于这种“复线的历史”注意研究历史话语形成的具体过程，这就便于我们在所摄取的话语系统之外去发现历史性。

第二大部分共包括五章，实际上是作者为尝试“复线的历史”而撰写的一系列个案研究论文的汇集。其中，前两章集中论述历史叙述结构与历史表述是如何摄取或隐匿与其世界观不相适应的错综复杂的历史现实的。第三章考察 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国民党人与民间信仰或“迷信”的冲突。在作者看来，在那场反宗教迷信运动中，现代性的表述不仅隐匿了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世界，甚至不得不将其自身意义的变化也一并隐匿起来。第四章探析辛亥时期的革命家是如何努力从民间秘密会社摄取浪漫叙述结构并将之融入一种全球性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民族主义话语系统。最后三章探析边缘叙述结构是如何向辛亥革命以来业已占据话语霸权地位的、强调集权、强调国家的历史叙述结构提出挑战的。其中，第五章涉及近年来国际中国学界有关晚清中国是否存在“市民社会”的论战。作者从能动的历史观出发，探讨了 19 世纪末的历史人物是如何试图通过重构过去来建立一个现实的市民社会的。第六章主要分析 20 世纪初期中国的“联省自治”运动为批评中央

集权、建立自下而上的民族观而努力追寻的替代性历史叙述结构。最后一章集中反思现代性，作者一反以往学术界在比较现代化研究中多以中日或中俄两国现代化为比较对象的做法，对 20 世纪上半期中国和印度两国思想家对于现代性的反思和批评及其对于线性的、进化的现代民族史观的抗拒进行了比较研究。

杜赞奇此书具体论点上或有可商之处，史料，尤其是中文史料的使用上未必尽妥，个别章节中的表述也不无冗繁之感，但从总体上看，此书视野宏阔而不失精深，既能以全球眼光来审视近代中国历史，又能从关键之点切入，洞察细微，把握要害，融世界与中国、历史与现实、思想文化与政治实践和社会制度等诸多因素于一体，尤其是书中所提出的“复线的历史”的观念，对于拓宽近代史研究的视野，深化对近代中国史的理解，特别是拓展对于近代中国史学与政治社会互动关系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无疑是自 20 世纪 70~80 年代国际学术界“语言学转向”和美国汉学界“在中国发现历史”思潮出现以来较具代表性的学术著作之一。希望此书中文本的出版，会对近现代中国史的研究起到一些推动作用，则我们作为译者，将会感到万分荣幸。

此书译稿完成于去年 12 月，后经原作者杜赞奇先生及其助手李海燕审阅，并提出了修改意见。由于出自多人之手，译文风格上前后不尽统一，加以译者水平有限，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我们诚盼方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在翻译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北京大学刘东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罗琳研究员、清华大学彭刚博士、刘晓峰博士等的帮助和支持，在此谨表衷心感谢。

王宪明 2001 年 11 月于清华园

导 论

现代社会的历史意识无可争辩地为民族国家所支配。然而，尽管历史总是属于某个民族，民族本身却是颇有争议的现象。一个民族内的政权、政治家以及普通百姓并不总是能对本民族应该做什么或意味着什么达成共识。无怪乎研究民族主义的学者对“民族”、“民族国家”及“民族主义”等词语的界定感到非常为难。自从1882年厄尼斯特·冉南发表题为《什么是民族主义》的演讲之后，学者纷纷试图给这些概念下定义。路易斯·斯尼德为澄清民族主义而撰写了一篇长达208页的定义（Snyder, 1983: 253）^①。如果存在于历史中的事物真的不能界定，那么，民族在历史中寻求最终归宿，就显得十分滑稽。当然，尤其奇特的是，我们仍然很难撰写出不属于当代任何一个民族的历史。

本书着重研究20世纪初期的中国，我将探讨民族国家、民族主义与线性进化史之间的密切关系。我对民族和民族主义的理

① 一般而言，对民族主义定义的讨论都围绕着这样一些方面：主客观条件的相对比例和角色，以及怎样区分少数民族性（ethnicity）与民族主义。一些不那么显而易见的问题则很少被论及，如：在同一个民族内异质性（heterogeneity）意味着什么，某些集团是怎样被包含在民族之中而另一些集团则又是怎样被排斥在外，一个团体是怎样获得或丧失其民族认同感的，等等。

解不仅基于中国的民族主义，而且更主要的是基于当今世界各地的事态的发展。在我们这个时代，民族这一概念极不稳定，我们甚至不能断定它是在发展还是在衰落。正在迅速出现的民族形成、毁灭、再形成的过程中，便是民族的偶然性和争议性。这与把民族当成一个不断演化的统一体的观点形成鲜明对照，使我们因此有必要检视民族历史的形式层面。当代研究历史叙述结构的论著，尤其是对因果论式的进化史的批评，对于我们目前的研究大有裨益。在进化史中，历史运动完全被看成是前因产生后果的过程，而不是过去与现在之间复杂的交易过程（transactions）。通过把对进化史的批评与民族主义的研究结合起来，我们便有可能析解历史与民族之间的深层的、执着的和（正如我们将要论证的那样）具有压抑性的联系。

我的主要论点是：民族历史把民族说成是一个同一的、在时间中不断演化的民族主体，为本是有争议的、偶然的民族建构一种虚假的统一性^①。这种物化的历史是从线性的、目的论式的启蒙历史的模式中派生出来的。我将用粗体的历史来表示后者，以区别于其他讲述过去的形式。启蒙历史使民族国家把自己看做是一个存在于传统与现代、等级与平等、帝国与民族国家的对立之间独特形式的共同体。在此框架内，民族成为一个体现能够推翻历史上被认为仅代表自己的王朝、贵族专制以及神职和世俗的统治者道德和政治力量的新的历史主体。与此相反，民族是一个集体的历史主体，随时准备在现代的未来完成自己的使命。我在此粗略地勾勒出的这种叙述结构不仅描述民族历史的基本架构，而

① 《牛津英语词典》是这样定义“主体”的现代哲学意义的：主体是“更具彻底的自我意识或思维能力……是一个思索的或认知的主体，是自己或自我。”（《牛津英语词典》，牛津大学出版社，1971年缩印本，2：3120）

且还支配着众多的通俗与专业的现代历史。虽然它与现代民族国家同时诞生，但战后的现代化范式更进一步强化了其中许多重要的对立。最近关于民族主义的理论虽然已经与这些对立部分脱钩，但却仍与其他对立联系在一起。

在此种语境下，20 世纪初期的中国格外富有研究价值。这不仅是因为现代民族主义在此期间在中国扎下根来，同时也因为正是在这一时期启蒙历史的叙述结构以及一整套与之相关的词汇，如封建主义、自觉意识、迷信和革命等，主要通过日语而进入中文。这些新的语言资源，包括词汇和叙述结构，把民族建构为历史的主体，改变了人们对于过去以及现在民族和世界的意义的看法：哪些民族和文化属于启蒙历史的时代，什么人或什么事必须从此种启蒙历史中排斥出去。由于我们自己的历史观念与民族线性的历史有许多共同之处，我们往往倾向于把历史当做认知的透明媒介，而不是将之看做一种话语，一种使历史人物（包括历史学家）得以用来阻碍、压制、利用其他讲述过去和未来的方式，或在某些时候与这些方式进行协调。

本书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共两章，论述民族作为启蒙历史主体的理论问题。第一章探究正在兴起的民族接受启蒙历史的叙述结构的辩证过程，以及这一历史是如何制造出一个同一的、从远古进化到现代性的未来的共同体。我将以 20 世纪初至民国时期（1911~1949）几部有影响的中国通史为例，来考察这种叙述结构的盛行、其独特的修辞以及其分期策略。在第二章中，我提出了一个内涵较为宽泛的“复线历史”（bifurcated history）的概念来代替线性历史的观念。过去不仅直线式地向前传递，其意义也会散失在时空之中。复线的概念强调历史叙述结构和语言在传递过去的同时，也根据当前的需要来利用散失的历史，以揭示现在是如何决定过去的。与此同时，通过考察利用过程本身，复

线的历史使我们能够恢复利用性的话语之外的历史性。这样，我将在超越或反省线性历史的目的论的同时拯救历史。

第二部分包括 5 个倚重文本的个案研究，是我撰写复线历史的一系列尝试的成果，目的是要在民族进化历史的范畴和框架笼罩的阴影下闪烁出一星亮光。本部分前两章集中审视历史叙述结构和表述是如何利用或掩盖与之不协调的复杂的历史现实。第三章考察 20 年代后期民族主义的改革家与民间宗教或迷信的交锋。在那次斗争中，对现代性的表述（相对于封建迷信而言）不仅掩盖了一个复杂的社会世界，而且还掩盖了自身意义的变化。第四章探讨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家企图把秘密会党的浪漫叙述融入一个全球化的有关种族国家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话语的努力。其余各章考察有关民族的替代叙述是如何以朦胧的或试探性的声音去挑战自共和革命以来即占据霸权地位的中央集权的国家主义的历史叙述结构。我在第五章中一定要冒险参加已处于强弩之末的有关帝制晚期中国是否拥有“市民社会”的论争。但是，我是从一个更能动性的历史观念的角度加入这一论争的：所探讨的是 19 世纪末的历史演员如何试图（即使是短暂地）重新讲述其过去以便现在实现市民社会。第六章，“地方对民族的叙述”，集中探讨 20 世纪早期的联省自治运动，诉诸非主流的历史叙述结构以批评中央集权，并阐述其自下而上的民族观念。最后一章对 20 世纪上半期中国和印度一部分人士利用“文化”这一替代性基础挑战历史结论、批判现代性进行评价。

虽然我的目标是批判作为历史主体的民族，但是我深切地意识到，至今还没有什么能完全替代民族在历史中的中心地位。且不谈别的，不论是作为历史学家，还是普通的个人，我们的价值观都是由民族国家所塑造的。毫无疑问，我之所以定期回到对我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印度的研究，正是与牵系于民族的纽带有

关。印度研究领域中近来出现了对民族启蒙历史的猛烈批判，尤以著名的贱民历史学派对之所作的批评为甚。虽然我不是一个印度问题专家，然而我受仍然模糊地定义为“后殖民主义”的理论框架影响较大。此种理论渗透于印度及其他地区新派的学术研究之中。依我看来，后殖民主义旨在批判现代独立的民族国家继续在旧的殖民主义或启蒙历史的格局及其有关不同生活方式和时间的等级之内运作的方式。我试图从这一相对陌生的历史编纂学的高度来思考中国，以打破中国历史的叙述结构的稳定性。

与此同时，我在第二章和第七章中还要利用我对印度的兴趣和知识对中、印两国进行比较研究，并借此使比较历史本身摆脱大家所熟悉的历史格局。中国历史学中大多数的比较研究总是把中国跟日本相比，无一例外地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比日本慢？本书的比较层面（不局限于与印度的比较）将努力打破这种历史叙述结构的中心地位或既定性。在比较中，我将探究这些不同的社会把启蒙历史与本土叙述结构联系起来的方式，探寻历史企图遮掩或者利用的领域，以及各个拒绝其渗透或抵抗其霸权的领域。

想像的民族：谁想像？想像什么？

在本书中，我预设了一个特定的民族观念，此一观念对于那种认为民族主义代表着统一意识或身份认同的观点持批评态度。概论的后半部分提出了我自己对民族主义的理解——即民族主义虽然宣称是统一的或具有统一功能的身份认同，但实际上是一种包容差异的现象。随着心理分析、哲学及其他领域的进展，“身份认同”一词已变得颇有争议性。不论在这里还是在别处，我的锋芒都指向那种假定有一个认同于社会或文化表述的先验

的、原始的自我的观点。在此，我们无需赘述汗牛充栋的文献，请允许我声明：我使用身份认同来指称由某些表述在与其它表述的关系中所产生的主体位置。换言之，一个认同于或被联系于某种表述（如民族）的“先验”的自我本身就已经是由另外的表述所产生的一系列主体位置，如妇女、朝鲜裔美国人、浸礼会教徒等等。故此自我不是原初的或单一的建构，而是在许多变化的、常常相互冲突的表述网络中建构的。

我建议从这种流动的表述网络中来理解民族认同的原动力。我们也因此需要摒弃在大多数民族主义研究中普遍存在的两种假设。第一种假设把民族看做是一个有内聚力的集体主体。但民族主义很难说是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确切地说，它代表了对于民族的不同表述之间进行斗争和协商的场所^①。第二种假设认为民族主义意识自身是一个独特的、前所未有的意识形式。虽然民族主义理论把自己置于表述网络中的特权地位，自视为一个囊括或维系其他认同的主身份认同，但实际上它只是众多认同中的一个，与其他身份认同是可以互变互换的、冲突或和谐的。这不仅对于现代认同是如此，即使如我们将在第二章中要看到的历史身份认同也是如此。

现代民族主义的新颖之处在于近百年来遍布全球的民族国家的世界体系。这一体系将民族国家视为主权的惟一合法的表达形式。民族国家是一种有着明确疆界的政治体制，其中“代表”民

① 就此而言，我对诸如民族主义之类的大概念的破坏性解构或内向爆破也许会使人观念类似于实证主义个人或集团的极大功用理性选择理论。但在我看来，功利本身就是由话语所界定的，更重要的是，功利常常混迹于多种建构个人或群体的话语或表述的游戏之中。在本书中，我们自始至终都会碰到关于自我的表述的多样性、变动性和含混性，这又常常为语言的多义性所调和或掩饰。

族—人民 (the nation - people) 的主权国家不断扩展自己的角色和权力。在第一部分中我们还会更进一步讨论这一体系。

当然,民族国家体系跟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及其他学者所撰述的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全球经济有关。根据沃勒斯坦的早期著作,现代国家与全球资本主义劳动分工的要求有着密切的联系,后者为了使资源非匀称性流动,必然在资本主义的核心区域缔造强大国家,而在边缘区域缔造弱小国家(1974)。许多批评沃勒斯坦模式的人指责他对边缘区域新兴国家的建国的相对自主性认识不充分(Meyer, 1980; Duara, 1988a: 3)。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沃勒斯坦似乎对这一问题有所认识。他提出,民族国家的形成为边缘地区的某些社会形态获得“核心”地位提供了手段(Wallerstein, 1991: 81~82)。他关于民族国家有助于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观点与我的研究是一致的,但我更着重考察的是,作为历史意识传播并征服其他“非进步”形态的时间的最重要话语途径的民族国家之兴起是怎样有助于资本主义渗透发展的。同时,民族国家体系和民族认同都是非常复杂的问题,可以在不考虑世界经济的情况下进行讨论。民族对于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不同,以及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与民族国家的世界体系之间的变换不定的关系,本书虽略有涉及,但作者将另有专题进行研究。

从历史上来讲,民族主义独特和新颖的地方不在于认同形式或意识形态等认识论的范畴,而在于全球性的体制革命。此种革命产生出极强有力的民族国家表述。在民族国家出现很久以前就存在着总体化的、自觉的政治共同体。再者,即使在现代,民族国家尚不能竭尽个人认同,更未能把民族的意义限制在自己的表述中。现代民族国家必须面对其他(包括历史的)共同体的表述,甚至与之交锋。当我们考虑到民族认同的含混性、变换性与